

2021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and Chinese Feminist Criticism : On the Theoriza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in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Socialist China

Xi Liu
xi.liu@xjtlu.edu.c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Xi.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and Chinese Feminist Criticism : On the Theoriza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in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Socialist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021, 42(1): 177-18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后结构理论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

——以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妇女“主体性”为中心

刘 希

摘要: 本文首先以“主体性”概念为中心,梳理后结构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和两种理论间的复杂关系,然后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性别文化的研究,探讨妇女“主体性”概念和研究范式在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本文以三个在“主体性”观念上对此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家阿尔都塞、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为例,试图呈现后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复杂谱系:有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对后结构理论的运用,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去本质化”和历史化的批评实践,也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后结构理论的反思和批评。这个过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批判理论对中国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冲击,也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社会话语的变迁对研究范式的影响。

关键词: 后结构理论; 女性主义批评; “主体性”

作者简介: 刘希,文学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崇文路8号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 215123。电子邮箱: xi.liu@xjtlu.edu.cn。

Title: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and Chinese Feminist Criticism: On the Theoriza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in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Socialist China

Abstract: Centering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subjectivity," this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impact on as well as their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Western feminism. It then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zation of "women's subjectivity" in academic research on Chinese women and gender discourses in socialist China from the 1980s. By exami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 influential theorists, Louis Althusser, Michel Foucault, and Judith Butler,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how the complex genealogy of "appropriating"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for different agenda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eminist criticism. Some scholars integrated post-structural ideas into liberal-humanist discourses; some employed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 to de-essentialize and historicize the analysis of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socialist Chinese women; some questio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in studying the Chinese socialist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of theorizing "female subjectivity" have proven to be influenced and informed by the changing ideologies and social discourses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Keywords: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feminist criticism; "subjectivity"

Author: Liu Xi, Ph. D.,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a Studies,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field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Department of China Studies,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8 Chongwen Road, Suzhou 215123,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mail: xi.liu@xjtlu.edu.cn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各种文学、电影和宣传画等文化文本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而研究的主流话语

和范式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对社会主义时期大量文化文本中妇女形象、性别话语和女性主义文化实践的考察和评价更是呈现出不同的立

场和显著的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者们借助不同的批判理论,如各种流派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后结构和后现代理论等去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十七年”(1949—1966年)间的各种性别文化文本,也借此讨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就和不足。

与此同时,新时期以来近现代妇女史以探究中国妇女怎样成为重要的历史主体为己任,“主体性”以及“能动性”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中的关键词。“人们开始重新探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逐渐意识到探寻中国女性主体性的重要性。”(侯杰 李净昉 77)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和性别文化的相关研究中,“主体性”更是勾连着不同的女性主义话语资源,成为一个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仔细梳理此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著作,会发现其中“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受到了不同的后结构理论家特别是阿尔都塞、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的重要影响。但是,不仅西方女性主义与后结构理论有着复杂的、不稳定的关系,中国研究界的不同学者在挪用后结构理论时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运用,表现出一种“语境化”的接受,即根据学者所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和他们自身的不同立场将理论重新定位,并勾连着不同的议程。近年来,深受后结构理论影响的“主体性”范式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和反思,很多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将后结构理论本身再历史化,讨论其盲点和不足。

目前中西学术界都还没有研究系统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研究中“主体性”特别是“妇女主体性”的认识论和研究范式的变迁,也没有足够的研究梳理阿尔都塞、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的批判理论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接受和应用。因此本文尝试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探究近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妇女和性别研究重要著作中的“主体性”概念,分析其背后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话语资源及立场,并追踪后结构理论在中国复杂的旅行史。

一、后结构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了“解构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广义上被称为“后结构”理论的思潮全面冲击了人文和社会学科,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流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西方都有很多学者梳理这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探讨前者为后者提供的重要的批判性工具以及后者对前者不断的反思。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女性主义思潮之间曾经有过“不幸福的婚姻”,那么后结构理论和女性主义思潮之间也有“不稳定的结盟”。^①

关于后结构理论给当代女性主义思潮带来的重要启示和影响,可以先从一些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核心理论的总结说开来。简·弗拉克斯(Jane Flax)曾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论定位为三个“死亡”: (大写的)人、历史和形而上学命题的“死亡”。首先,关于(大写的)人之死,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历史的或语言的产物,主体是在历史的、依情况而定的,变化的社会、文化和话语实践中被建构而成的。这一点启发女性主义破解对男性中心的理性主体的迷思,在西方哲学最深层的范畴中发现被抹去的性别差异。其次,关于“历史之死”,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大写的或自在的历史与大写的人一样是虚构的,关于“进步”的历史观支撑了同质性、整体性、封闭性和同一性等观念。这启发女性主义关注“历史叙事”的产生,发现了启蒙运动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哲学迫使历史叙事走向统一、同质和线性,其结果是碎片化的、异质性的、被边缘化的群体的经验被抹杀。第三,关于“形而上学之死”,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形而上学相信一种超越历史、特殊性和变化的统一存在,很多基本概念是从它们所压抑和排斥的对立项中获得权威和价值的。女性主义因此开始怀疑所谓超历史和语境的理性主体,认为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利益的知识纠缠在一起(Flax 32 - 34)。

在“主体”的问题上,后结构理论的几个重要理论家如福柯、德里达和拉康都从不同方面对现代认识论中的主体中心主义作出了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发现现代性的主体形成过程包含着“屈从”(subjection)的过程,而主体化(subjectivation)本身是一个通向现代性的手段。“主体化”这个批判性的概念是将被赋予了给定的各种利益、偏好、选择的主体生成过程去自然

化,然后质疑那种关于结构代表、赋予或者剥夺主体权力的看法。”(Smith 956)后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询唤”“主体”的理论也阐明了个体的存在并不先于任何社会政治关系。他认为“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功能,把具体的人询唤为具体的“主体”。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的形成是一个与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紧密互动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策略性的且永远未完成的过程。

不同的后结构理论都表达了对“主体”“结构”“权力”的理解必须是复杂、多元和历史的。“权力”不被认为是单向的,仅仅是统治者管理、监视、惩罚、压迫从属者的工具,从属者也没有仅仅被看作被动的受害者。后结构理论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反对社会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主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彻底依情况而异(contingent)的过程。后结构理论拆除了笛卡尔式的构成主体(constituting subject),强调主体是在话语结构中被建构的。但他们并没有以被建构主体(constituted subject)取代构成主体,而是试图提出一个打破构成和被建构之间二元对立的主体概念。

这些后结构理论启发女性主义者们认识到,“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建立在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苏红军 24—25)。她们因此破除了那种对统一、理性、普遍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迷思,认为人的主体意识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话语和权力关系中形成,又参与到权力关系的运作之中,可能由不同的甚至矛盾的主体立场整合而成,是不断变化、复杂、动态和多元的。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认为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后现代主体批判的重新表述,为主体的重建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Hekman 46)。在她看来,女性主义重建“主体”概念的努力之中,有两条路径是特别有见地的。一是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努力界定构成主体与被建构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个方向是试图以主体去中心化取代构成/被建构的二分法,表达一种新的“既可以创造新话语,又可以抵制定义主体性的话语所内在固有的压迫的”主体概念(Hekman 48)。第一个方向被称为“通过辩证法重建主体”,代表女性主义

学者有特蕾莎·德·劳瑞蒂斯(Teresa de Lauretis)、琳达·阿科夫(Linda Alcoff)和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他们强调主体性构成中的语境性质和话语在主体形成中的作用,但同时认为主体的创造性是指人有能力在他们所受的多种话语影响中进行筛选。然而海克曼认为,这几位学者没能发现后现代概念并不是简单地用被建构主体取代构成主体,而是完全取代了这种二分法(Hekman 51)。可以说这个方向的学者的“辩证法”并没有完全抛弃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笛卡尔式主体中关于自治的观念。

第二个方向被称为“通过取代辩证法重建主体”,代表学者是露丝·伊里加蕾(Lucy Irigaray)、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法国学者。他们受到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等理论的影响,一直对现代主义的主体论持怀疑态度。如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概念,试图拒绝笛卡尔的构成主体和被建构主体之间的二分法,将这种主体理解为由不同话语形式以不同方式建构而成,但又不是被动的,因为每一个新的被建构的主体都能改造和革命它之前存在的主体,都包含着可以解构它之前挑战的那个主体的潜力。海克曼认为克里斯蒂娃也重新解释了“能动性”的概念,认为这是话语的产物,是语言在话语建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位于“内在空间”中的固有性质(Hekman 54)。

笔者认为另外两位受到后结构理论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维登(Chris Weedon)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属于第二个方向。维登认同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的概念。她也认为个体并不是话语斗争的被动场域,因为个人“可抵抗特定的命名,或从现存话语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中产生意义的新叙述”(维登 123)。她认为创造主体性的力量并不是一个无缝的整体,语言的间隙中存在的空间和歧义阻碍了对主体性的统一决定,正是这些间隙和歧义创造了改变和抵抗的可能性。这也是对福柯关于权力总是制造抵抗的观点的女性主义的延伸。巴特勒认为对权力的解构是真正的政治批判的前提。把主体建设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不等于把主体去掉,而是质疑那种主体的建构是一个事先给予的或基础主义的想法。如果主体是由权力建构的,那么权力

在主体形成的那一刻并没有停止,因为主体从来没有完全建构完成,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屈从和产生。这一主体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产品,而是一个永久性的再表意(resignification)过程。巴特勒也认为主体是被建构的并不意味着它是被决定了的,相反,主体被建构的性质正是它的“能动性”产生的先决条件(Butler 167)。

对于以上所讨论的第二个方向中的理论家们而言,后结构理论中的“能动性”(agency)概念虽然对立于决定论,但也不等同于传统人文主义中的关于自治主体的唯意志论。能动性涉及人或其他生命实体行动或干涉世界的能力,但又是一个情境中的概念,不是一个有关具有绝对的能力或潜质的抽象概念,不可能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之外思考能动性,因为行动的能力从来都被统治性的规范或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所规约和调节。能动性是“情境性”(situated)的,我们无法脱离具体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去思考行动的内容和形式,更不能忽略对具体权力结构的分析;能动性是“具身性”(embodied)的,作为一种实践的行动,不需要具备充分的、理性的意向性,这强调了能动性的情绪和情感的维度,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强调各种社会控制力量是如何被内化为各种身体性的规范的,但它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被改变;能动性也是“相关性”(relational)的,要破除那种对单一的、先于社会存在的主体本体论的想法,认识到主体既被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被权力的各种等级结构所建构。

在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从后结构理论中汲取力量,增强其政治性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探讨后结构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可能削弱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政治性和批判力。有学者认为对现代性的构成主体的拆解和对差异的强调会分解和碎片化女性主义运动,无法推进处于结构性劣势的妇女的利益(Genz Brabon 111)。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使得对女性这一群体的共同属性和建立在同一立场上的政治诉求难以实现(刘岩 11)。还有学者担心后现代的去中心化和“话语”转向会影响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和政治性,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不确定性、权力的碎片化和不稳定性的强调会影响我们对压迫性的权力结构的,特别是妇女所从属的物质的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苏红军 21)。

笔者认为后结构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并非统一的,虽然大部分理论家都强调权力的不确定性和话语性,但并非所有后结构女性主义派别都倾向于以语言取代物质和受压迫的权力关系。如维登就始终强调话语实践与物质权力关系的结合,“话语实践乃是被深置于物质权力关系之中;而物质的权力关系亦需要转化,以使改变得以实现”(维登 124)。巴特勒也认为后结构视域下的“主体”是“充分嵌入各种物质实践和制度安排的组织原则中,并在这种力量和话语的矩阵中构建而成的”(Butler 160)。这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对话语的分析与对物质的结构的社会现实的考察结合在一起,而有些学者所担心的会反映压迫语境的不确定性的问题的确值得反思。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认为,为了有效批评像男性统治这样普遍性和多面性的现象,需要多种方法的结合,如“至少需要对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大叙述,对宏观结构和制度的经验的和社会理论的分析,对日常生活微观政治的互动分析,对文化生产的批判性阐释学和制度分析,对特定历史和文化中的性别社会分析等等”(Fraser and Nicholson 249)。她们探讨如何将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怀疑与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力量结合起来,使得女性主义理论有效应对“千变万化又千篇一律”的性别不公问题。她们认为,首先,必须认识并且否定后现代主义对分析社会宏观结构的放弃,女性主义者不必放弃解决重大政治问题所需的大的理论工具;其次,女性主义理论的“理论性”必须是彻底历史性的,适应于不同社会和时期的文化特性,以及不同社会和时期内的不同群体;再次是“非普遍主义”的原则,注重变化和对比,而不是“普遍规律”;最后,摒弃历史主体(a subject of history)的概念,以及单一的“妇女”和“女性性别认同”概念,而代之以多元复杂的被建构的社会认同概念,将性别视为一个相关的链,同时兼顾阶级、种族、族裔、年龄和性取向(Fraser and Nicholson 258)。总的来说,她们认为应当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根据手头的具体任务调整女性主义的方法和分析范畴,抛弃单一的“女性主义方法”或“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因为妇女需求和经验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任何单一的解决办法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258 -

259)。

以上梳理了后结构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后结构理论影响下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主体性”和“能动性”概念的重新界定和运用。不同学者切入主体观念的理论路径不完全相同,以上的梳理的确说明了后结构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有着“不稳定的结盟”,但是其中大多数理论家都关注性别化主体的形塑过程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主体和结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被认为是多重的,有其具体的历史性的。性别化的主体不是绝对自治的行动者,而是各种控制和反抗的话语构成的力量场中的产物。各种对于人的规训、规范、限制和要求的力量最终生产出了“主体”这个各种身份认同的聚合,但是主体又可能走向其他的方向,获得新的可能性。同时,大多数受到后结构理论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认同应该将“能动性”重新认识为情境性的、具身性的和相关性的。他们注重主体形成的具体的历史性,注重对权力和统治问题的交叉性的分析,有些已经表明物质实践和制度结构与话语的密切关联,也尝试从不同的层面去发掘妇女潜在的对抗性力量。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不能放弃对大范围不平等进行理论的分析,但不愿回归到对“普遍规律”或者“形而上学本质”的迷思,他们呼吁复数的“女性主义”的实践,倡导更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实现女性主义团结的方式。

二、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中的 “主体性”概念变迁

在梳理了后结构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和两种理论间的复杂关系后,笔者转向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文化批评,探讨妇女“主体性”概念和研究范式在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性别话语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妇女在这场运动中被“自上而下”地解放,她们并没有获得主动的“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而这种对“女性意识”的追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领域最为热烈。贺桂梅和钟雪萍等学者都认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们积极寻找女性作家在文学表达上的差异性,

将其认为是真正“女性意识”的显现,这种“女性意识”的核心是自然化的性别差异,是本质主义化了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和“性本质”(sexuality)。^②“1980年代逐渐兴起的‘女性文学’思潮与批判、告别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启蒙主义式的‘人性论’、‘欲望论’密切相关,或者说女性文学本身成为承担去革命、去政治化任务的重要文化阵地。”(刘希,《底层妇女》100)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研究者的主要的理论资源是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以来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等。“性别差异”和“女性意识”的概念成为当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

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孟悦和戴锦华著名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探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神话背后掩盖的问题。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第一部探讨女性文学差异性和独特性的重要学术著作,在女性文学界和妇女研究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多是“党的女儿”,而非独立的个体。“她在一个解放、翻身的神话中,既完全丧失了自己,又完全丧失了寻找自己的理由和权利,她在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里,似乎已不应该也不必要再寻找那被剥夺的自己和自己的群体。[……]对于她,‘男女平等’曾是一个神话陷阱,‘同工同酬’曾不无强制性,性别差异远不是一个应该抛弃的概念,而倒是寻找自己的必由之径。”(孟悦 戴锦华 268—269)这是作者对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也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评论,而寻找表现“性别差异”和女性独特性的妇女文学作品则是这本书的主旨。在勾勒现代中国女性传统的、独特的写作的过程中,《浮出历史地表》较早地介绍并运用了后结构理论,特别是拉康的后结构心理学女性主义。

1991年,孟悦的《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一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也结合了对背后的社会语境的评论。文章认为《青春之歌》和《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和女性作家的代表作都经历了一种个体话语被“国有化”的文本生产过程,即“个人自我”走向了“‘革命者’标准化的国有的‘大我’”(孟悦 108)。孟悦认为这种“国有化”中的主体生成过程是去性的,是抛却性别意识的。在论述“性别意识”和“个人自我”之时,孟悦第一

次借鉴后结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的“主体”概念去阐述社会主义文学中建构的新的政治“主体”：“这种‘非性别’的主体结构所造就的当代中国主体只有一种含义，即所谓‘主体’，在当代中国，亦即进入对权力意义中心的绝对臣属关系。”（孟悦 112）她的研究开始关注主体的形成与权力中心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被理解为一种简单和单向的“臣属”的关系。这篇文章的英文版“Female Image and National Myth”^③后来被收入汤尼·白露（Tani Barlow）主编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一书中，在中西学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这两个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开拓性的研究都借鉴了后结构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视角，其基本立场都是质疑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国家话语，探讨超越这种宏大叙事的妇女自主意识的可能性。它们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妇女社会学研究（如李小江的研究）一起，在中西学界“告别革命”、反思“极左”社会主义实践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共同参与到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得失的反思之中。它们与同时期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探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失败”原因的主导性研究^④相呼应，显示出一种“与西方同步的文化转向”，并且这种文化转向“同资本以及知识市场全球化的世界关联”（王玲珍，《重申新时期》103）。

20世纪90年代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研究有了些新的视角和方法，其中也包含对后结构理论的运用。1995年出版的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叙事和性别》是第一本系统地从事叙事学角度讨论“十七年”文学中性别话语的著作。受到孟悦研究的启发，陈顺馨开始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男性”特质，即意识形态话语和男性话语的统一。她认为所谓“十七年的‘无性别’只是一个神话陷阱，这个年代所压抑的只是‘女性’（femininity），而不是性别本身”（陈顺馨 114）。在“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陈顺馨第一次借用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有关“权力”和“话语”的理论讨论性别化的叙事。她认为“十七年”时期的小说话语体现了“权力”，同时也是“男性”的。同时，她认为“十七年”小说中不是没有“女性叙事话语”，这种女性话语虽然对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认同的，但是在“怎么说”方面有别于男性话语，特别是在表现“女性自我、主体性和选择等话语

意向”上“坚守了女性本位”，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有迹可循的“女性话语”（陈顺馨 115）。通过研究大量女作家作品中的差异性叙述方式，她找到了“十七年”文学中潜隐的保留了“主体性”的女性话语。

虽然没有系统地对“主体”“主体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但孟悦和陈顺馨的研究都开始引用了这些来自阿尔都塞和福柯的概念。从陈顺馨开始，“主体性”这个概念已经跟“性别差异”“女性特质”这些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书写中保留了“主体性”的“女性话语”被认为与主流的男性话语针锋相对，尽管被压抑却可以被潜隐地和策略性地保留。如果说孟悦文章的中心观点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国有化”过程中的去性别、去差异性，而陈顺馨一书的核心立场是寻找差异性的女性叙事方式的话，那么探讨革命和性别关系的英文著作——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⑤可以说是陈顺馨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深入。她在书中质疑孟悦式的认定“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基本上将浪漫爱情及其性别、性欲等全都归置于国家政治话语之下”的做法（刘剑梅 194），她借鉴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将性爱看作升华为政治热情的革命写作的观点，^⑥试图去寻求存留的“关于爱情、性本质和性别的文学描写”，考察它们是否“仍有力量去挑战革命话语”或者可以“把革命话语本身也看作是一个实验中的过程，并非是单一的毫无变化的大一统现象”（刘剑梅 194）。刘剑梅延续了陈顺馨关于“压抑性的主流话语”和“反抗性的边缘话语”的视角，没有将“十七年”文学看作铁板一块的权威性声音，而是选择去追踪变化的、有历史独特性的女性编码，寻找与政党权威相对抗的“性别自我”和“主体性”。但是在具体分析了《青春之歌》和《红豆》这两部作品后，她最终找到的女性“主体性”是她认为政治话语无法收编的对女性的欲望和性本质的描写“个人的欲望、生理的需要，以及真实的男人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性爱，都顽固地蔓延在小说叙述中，悄悄地对抗着那种已经升华到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感情。”（刘剑梅 230）从这本书的论证过程和结论来看，刘剑梅试图用自己的研究去发现“十七年”文学的多样性，质疑整体观和本质论并发掘保存“女性意识”的

个案文本,虽然她试图借鉴巴特勒后结构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去反对关于“十七年”文学的本质主义论断,但是她最终发掘和确认的还是基于女性身体欲望、性本质等的女性“主体性”。

尽管陈顺馨和刘剑梅对“十七年”文学文本中父权逻辑的分析和对很多女作家文本中对抗性话语的研究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见解并且都借鉴了一些后结构理论家的观点,但是她们对“主体性”这个概念却都有着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如孟悦将阿尔都塞的“主体”概念理解为人对意识形态、权力中心的“臣属”,注重结构的决定性而非人的能动性;陈顺馨用福柯的“权力/话语”观点去解读“十七年”男性中心的“政治话语”和女性话语的性别特质,但是又有着二元对立的关于男性“为权威”、女性“为边缘”的观点。刘剑梅也认可巴特勒的观念,认为女性身体不是超历史的,也不是先于文化的,但是她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女性差异性的欲望、自然属性在革命书写上带来的本质不同。在她们看来,合法的“女性主体性”只存在于个体性之中,合法的女性主体立场只存在于对统治性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中。只有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被强调了,身份认同之中的其他范畴如阶级、劳动、集体等都被排除在合法的“女性主体性”之外。这些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同样有着本质主义的理解,将其视为铁板一块的、从不变化的、控制一切的党的意识形态;其次将“主体性”或人的“主体意识”理解为有一个先在的、不受外在社会机制影响的,始终与外在意识形态/话语相对立、对抗的完全自治的主体,这样无论是“国家话语”概念还是对抗这种话语的“主体性”概念都是超出当时当地具体历史语境的。

戴锦华在其研究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青春之歌》的文章中提出,电影中女性故事是一种“空洞的能指”,但同时也作为一种有力的性别编码推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故事的展开。在这篇文章中,戴锦华同样借鉴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主体”的论述以及福柯关于“话语”的观点,来考察女性/知识分子作为“准主体”被意识形态编码和命名的过程(戴锦华199—201)。但是与孟悦对“主体”即为“臣属”的解读相同,戴锦华在此文中对后结构理论的运用强调了个体与社会权力结构的二元对立,忽略了

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后结构理论强调的是“主体性”从来不是先于、外在于历史语境和社会结构,而是与其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对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探寻从来都是与对具体权力结构的分析联结在一起的。

以上这些研究借用后结构理论概念却没有继承相关理论家的“反本质主义”思想,这或许与“后结构/后现代”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内在关联有关。如在第一部分中所分析的“通过辩证法重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也无法完全放弃对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关于主体的想象和界定。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后结构/后现代”转向本身就有着复杂的路径和方向,而以上中国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对于种种后结构理论的运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这种特点。

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也在英文和中文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影响。在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借用其中一些概念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文化文本生产的妇女“主体性”和“能动性”问题。美国学者蒂娜梅·陈(Tina Mai Chen)的妇女劳动模范肖像画研究就是一个代表。她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妇女劳动模范肖像画和劳模自身的经验,重新考量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她不同意那种将妇女解放仅仅视为服务于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流行看法,而是注意到女劳模多层次的实际经验和妇女与国家、对她们的文化再现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提出女劳模的一种“情境性的能动性(situated agency)”(Chen 268)。通过研究官方媒体对这些女劳模故事的再现和女劳模们对自身经验的讲述,她认为这些看起来过分简单化和说教性的故事和图像通过一种“再现性的经验(representational experience)”深深影响了女劳模自身的经验(Chen 271)。因为国家支持并将妇女解放纳入官方的政治话语,确认了妇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地位,同时还因为这种官方话语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使得这些女劳模们积极参与到对自己、对工作场所、对集体身份和国际社群的重新定义和理解中。而作者就是在考察了她们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后,更好地理解了这种并非外在于更大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妇女的能动性。国家话语的形塑有限制性的成分,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让她们参与到个体、国族和国际

的解放之中(Chen 295)。

在社会主义文学研究领域,也有学者挑战本质主义的、对妇女“主体性”以及“革命叙事”的理解。贺桂梅曾经质疑“再解读”式对革命叙事的解构,她认为“性别”或女性叙事在《青春之歌》中并不是“空洞的能指”,它作为一种能指与阶级叙事是有交互关系的,对其作本质化的理解会忽略革命与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贺桂梅,《可见的女性》8)。贺桂梅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是包容性的,不仅只在性别、自然属性维度上解读它,“主体最终的归属应当是阶级与性别的双重归属”(贺桂梅,《可见的女性》13)。这种“主体性”观念则是历史的和去本质化的。

也有研究直接借助后结构理论探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学实践,分析这一时期妇女主体性的具体历史性和复杂性。笔者研究韦君宜小说的论文也运用后结构主义重新考察“十七年”时期女作家的创作。这篇文章首先厘清了很多研究中本质主义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概念,提出要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和具体社会语境中去考察妇女的能动性(刘希,《毛泽东时代》75—76)。文章通过对韦君宜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女人》的研究,发现五四的个性解放话语和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同志关系”与男女平等的话语一起参与到了女性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国家话语与妇女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复杂的,不是简单的统治和反抗的关系。因此性别主体认同和妇女能动性的考察需要对不同国家、社会话语作历史化、语境化的探讨。

贺桂梅也曾提醒研究者们把女性“主体性”问题“放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场域里”来分析(贺桂梅,《三个女性》66)。她引用福柯有关任何主体都是与知识、权力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观点,但她认为福柯的理论提醒研究者去关注主体性实践赖以展开的具体权力场域;认为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提醒我们注意到“表演性反抗”本身的限度,“因为每个人只能在既有的权力结构内部来建构或展示自己的性别身份”,所以她关注“表演者”所置身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形态(贺桂梅,《三个女性》70)。在反对本质主义的“主体性”阐释之后,贺桂梅对“非主体性”社会结构的关注才有了超越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中心的倾向。她认为我们要注意“女性自我意

识、社会身份、组织方式等的‘社会建构性’,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文学、美学或文化研究之外的政治经济学讨论面向”(贺桂梅,《三个女性》45)。她的观点是借助后结构理论中“权力”或“社会建构”的维度去开启对物质性社会文化关系的关注,而并没有停留在后结构理论本身,可以说是利用后结构的一些概念和话语展开唯物主义方向的思考。

三、对“主体性”范式和“后理论”的反思

关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史和性别文化的研究,早在2010年召开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区别:理论与实践”座谈会上,就有很多学者开始重审20世纪90年代性别研究界流行的“主体性”概念以及相关对身份和身份政治的迷思。他们不仅批判了第一种以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来反抗国家主义本质主义的“主体性”概念,认为其“契合了资本主义精神”(宋少鹏,《社会主义》146),同时也警惕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流动的多元主体身份的去政治化。钟雪萍认为在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研究中,后结构主义话语“使性别与性的问题进一步细化甚至碎片化”(钟雪萍 56),无法充分发现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在运动中产生的自我认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宋少鹏进一步讨论了涉及以上两种范式的“主体性”和性别研究理论的意义和不足。她认为主体性范式挖掘妇女作为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作为行动者而不是无力者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但她呼吁我们关注制度性压迫的问题,并分析主体和制度的问题,她认为补救“主体性”范式不足的方法就是借鉴革命范式对于制度、对于客观性的剖析(宋少鹏,《革命史观》56)。这些研究挑战了自由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论述,是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将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从个体的行动转向对物质性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关注。

王玲珍在近年的系列研究中发现中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社会主义或者左翼女性主义转向激进、文化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她提醒我们将后结构主义本身进行历史化,看到后结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西方历史中的相通性,特别是在冷战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共谋立场。^⑦她重新勾勒了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

践的历史,特别强调它的“整合/体性(integrated practice)”、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制性和国际性(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5)。她在对社会主义时期女导演王苹的研究中,提出对妇女在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中的考察要注意到在这种具体社会语境中诞生出的能动性的“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王玲珍,《王苹》79)。因为社会性别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实践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而是跟其他政治和社会的议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范围,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显著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化的特点,所以要从这一时期的多重历史力量的交叉中去考量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以社会主义时期的女性导演为研究中心,王玲珍发现“由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它强调多维度的主体性;同时,由于中国女性在社会主义阶段不断扩充的公共以及职业身份,中国女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开始占据多重的政治和社会位置”(王玲珍,《王苹》87)。她在这里采取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方法,突显中国特定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她提出“多维主体性”(multidimensional agency)(王玲珍,《王苹》74)更多的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化以后的概念同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已经有很大不同。

而在文学研究中,钟雪萍、贺桂梅、董丽敏等学者都提出在妇女主体建构上,需要考量劳动、阶级、职业等其他要素与身份认同及主体意识的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了贫富分化和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之后,女性主义者如何可以同时反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在文学批评中,开始有学者追问什么样的“女性文学”可以揭示当下社会中的性别、阶级、城乡等不平等,并且追问“面对父权和资本的合力侵袭,何为真正具有反抗性的妇女‘主体性’的问题”(刘希,《底层妇女》106)。而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紧密结合的历史遗产是我们思考当下问题的一个重要资源。“需要在对历史遗产作出反省的基础之上,寻找解决女性问题与阶级(民族)问题更适度的方式,以打开女性文学批评的新视野。”(贺桂梅,《当代女性》19)

近三年多来对“十七年”文学中妇女写作的

新的研究在论及妇女特别是底层妇女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问题时,已经更多地关注到底层妇女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还有公共生产劳动、职业身份对妇女主体性建构的贡献。如刘传霞和石成城认为茹志鹃小说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建构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其研究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对妇女的保护、鼓励,并看到集体化公共领域的生产劳动对妇女主体建构的积极作用(刘传霞 石成城 93)。在讨论“主体性”的时候,这个研究没有给出任何理论框架,但认为“主体性”不是给定的或由个体单独完成的,而是在与社会、他人关系的密切互动之中形成的。

董丽敏的茹志鹃研究论文也以茹五六十年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作品如何把底层和妇女的双重身份和多元诉求表现出来。茹志鹃被认为以“革命与性别的双重自觉”,以底层妇女为中心呈现了社会变革、阶级革命、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与人的情感结构和关系之间的复杂关系(董丽敏 52—53)。这篇文章将革命与性别的关系置于日常生活伦理和家庭人际关系的变化中去讨论,不再局限于寻求“主体性”的理论话语,但又基于对主体身份建构的客观性认识。这种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给当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很大的启发。

结 论

王宁在研究西方批判理论特别是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应用时发现“理论在异地传播时,其功能和意义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有时会出现不同的现象,表现为理论在中国几十年来的不断普及和繁荣。[……]但是,西方理论只有在语境化的条件下才能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应该在中国的语境中重新被定位。”(Wang 14)这种“语境化”的对批判理论的接受和应用也正是本研究的基本立场。

本文首先梳理了后结构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后结构理论影响下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主体性”和“能动性”概念的重新界定和运用。可以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后结构女性主义”的理论,后结构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的确存在非常“不稳定的结盟”。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无法完全抛弃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

主体观念和想象,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在其批评实践中也难以完全实现,这也证明了后结构/后现代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在历史中的深刻关联。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以不同方式从后结构理论中汲取力量,增强其政治性,也有很多学者探讨后结论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去宏大叙事、相对主义等视角可能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政治性和批判力造成削弱。有些学者强调从语言和话语层面去考察压迫性和能动性的问题,有些则强调在研究中注意话语实践与物质权力关系的结合,“主体性”“本质主义”“政治性”“物质性”等问题一直在探讨和争论之中。可以说,后结构理论与女性主义关系的这些复杂性、矛盾性或者“不稳定性”,在后结构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学术界的旅行中也显现了出来。

文本随后以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批评为例,探讨妇女“主体性”概念和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文化批评一开始受到了反思“极左”社会主义实践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挪用后结构和后现代主义如阿尔都塞和福柯的理论时使用的“主体”和“主体性”概念仍然是基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的,其核心观点是妇女“主体性”被外在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压抑,有本质主义化的问题。而在新世纪之后,中西学界开始重估被贬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性别文化文本,学者利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的概念和话语,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性别”“主体性”和“能动性”等概念去考察社会主义时期不同女性实践者“主体性”的复杂性,去发掘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的“能动性”,以“去本质化”、历史化的批评实践挑战主导性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话语;近几年,又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对后结构和后现代理论本身进行历史化的考量,反思其造成碎片化和去政治化的可能。他们对于“主体”“主体建构”的探讨逐渐脱离了后结构理论的话语框架,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文学和文化研究,更加注重主体研究中的政治经济面向。可以说,后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中有着复杂的谱系和旅行史,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后社会主义时期西方批判理论对中国人文和社会学学科的冲击,也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社会话语的变迁

对研究范式的影响。笔者希望这个梳理可以让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研究的研究范式转变更好地呈现出来,提醒研究者们关注西方批判理论在中国落地过程中被不断“语境化”的过程,关注如何反思性地运用不同批判理论,以更深入地剖析不同压迫性的话语和物质的社会文化关系,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拓宽理论的视野,同时保持其批判性和政治性。

注释[Notes]

① 这两个说法分别来自两篇论文: Hartman Heidi,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pital & Class* 3. 2(1979): 1 – 33; Benbabib Seyla,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An Uneasy Alliance,” *Filosoficky Casopis* 46. 5(1998): 803 – 818.

② 参见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第12—19页; Xueping Zhong, “Who Is A Feminist? Understanding the Ambivalence towards Shanghai Baby, ‘Body Writing’ and Feminism in Post-Women’s Liberation China,” *Gender & History* 18. 3(2006): 635 – 660.

③ Yue Meng, “Female Image and National Myth,”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ed. Tani Barlow,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8 – 136.

④ 代表性的几本著作有 Elisabeth J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hyllis Andor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 – 19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Margery Wolf,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以及学者哈里特·埃文斯(Harriet Evans)和杨美惠(Mayfair Yang)的一些研究论文等。

⑤ 刘剑梅的英文原著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3) 由郭冰茹翻译,中文版《革命与情爱: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于200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⑥ 参见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⑦ 参见王玲珍《重审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以李小江为例》,第109—124页;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

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第7—21页；王玲珍《王苹与中国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主流女性主义文化、多维主体实践和互嵌性作者身份》第76—90页。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Butler, Judith.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Ed. Seidman Stev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3 - 170.
-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叙事和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Chen, Shunxin. *Narrativ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hen, Tina Mai. "Female Icons, Feminist Iconography? 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 *Gender & History* 15.2(2003): 268 - 295.
-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再解：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唐小兵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207页。
- [Dai, Jinhua. "Song of Youth: A Historicized Re-Reading." *Reinterpretation: Mass Arts and Ideology*. Ed. Tang Xiaob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2 - 207.]
- 董丽敏《革命、性别与日常生活伦理的变革——对茹志鹃1950—1960年代小说的一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6(2018)：52—68。
- [Dong, Limin. "Revolution, Gender and Changes in Daily Life Ethics: A Study of Ru Zhijuan's Works during the 1950s - 1960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8): 52 - 68.]
- Flax, Jane.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Fraser, Nancy, and Linda Nicholson.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Ed. Seidman Stev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2 - 261.
- Genz, Stéphanie, and Benjamin A. Brabon. "Postmodern (Post) Feminism." *Postfeminism: Cultural Texts and Theor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6 - 123.
- 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10)：1—15。
- [He, Guimei. "How Could 'Visible Women' Be Possible: A Case Study Centering on *Song of Youth*."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3(2010): 1 - 15.]
- ：《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5(2017)：45—71。
- [- - - . "Three Female Figur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Gender System."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5(2017): 45 - 71.]
-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6(2003)：12—19。
- [- - - . "Three Resources for Contemporary Women's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6(2003): 12 - 19.]
- Hekman, Susan. "Reconstituting the Subject: Feminism,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Hypatia* 6.2(1991): 44 - 63.
- 侯杰 李净昉《探寻女性主体性——评叶汉明教授的〈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论丛〉》，《妇女研究论丛》1(2007)：76—79。
- [Hou, Jie, and Li Jingfang. "Quest for Women's Subjectivity: Review on Ye Hanming's *Searching for Subjects: Studies o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1(2007): 76 - 79.]
- 刘传霞 石成城《集体主义时期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从茹志鹃的〈如愿〉〈春暖时节〉谈起》，《妇女研究论丛》3(2018)：84—95。
- [Liu, Chuanxia, and Shi Chengche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among Urban Lower-Class Domestic Women during the Era of Collectivism: A Case Study of Ru Zhijuan's 'As You Wish' and 'The Warm Spring Season.'"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3(2018): 84 - 95.]
- 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 [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Trans. Guo Bingru.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刘希《毛泽东时代女性的主体性问题——以韦君宜小说〈女人〉为例》，《妇女研究论丛》4(2012)：75—81。
- [Liu, Xi. "Female Subjectivity in Mao's Era: A Case Study of 'Women' by Wei Junyi."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4(2012): 75 - 81.]
- ：《底层妇女的身体呈现——以三部当代女性小说为例》，《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2017)：

- 99—106。
- [- - - . “Subaltern Females and Sexual Discourses in Three Contemporary Chinese Female-Authoring Fictive Works.”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2017) : 99 - 106.]
- 刘岩 《后现代视野中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2.4(2011): 9—13。
- [Liu, Yan. “Feminism and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2.4(2011): 9 - 13.]
- 孟悦 《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二十一世纪》4(1991): 103—112。
- [Meng, Yue. “Gender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 *Twenty-First Century* 4(1991): 103 - 112.]
-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Meng, Yue, and Dai Jinhua. *Breaking the Surface of History: Women Writers in Modern China, 1917 - 1949*. Zhengzhou: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Smith, Anna Mari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a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eminist Theory*. Eds. Lisa Disch and Mary Hawkeswo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955 - 972.
- 宋少鹏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区别: 理论与实践”座谈会综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8.4(2011): 143—149。
- [Song, Shaopeng. “Conference Review on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Western Feminism: Theory and Practices.’”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8.4 (2011): 143 - 149.]
- : 《革命史观的合理遗产——围绕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讨论》,《文化纵横》4(2015): 50—57。
- [- - - . “The Reasonable Heritage of the Revolutionary View of History: Discussion on Studies of Chinese Women's History.”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4(2015): 50 - 57.]
- 苏红军 《成熟的困惑: 评20世纪末期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上的三个重要转变》,《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苏红军等编。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
- [Su, Hongjun. “The Confusion of Maturity: On Three Important Changes of 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Feminism in Western Post-ist Context*. Eds. Su Hongjun, et al. Nann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 39.]
- 王玲珍 《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肖画译,《妇女研究论丛》3(2015): 5—19。
- [Wang, Lingzhen. “Chinese Socialist Feminist Practice Reconsidered: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Persistent Influence of Cold War Ideology and Liberal/Radical Feminism on Socialist Women Studies.” Trans. Xiao Hua.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3(2015): 5 - 19.]
- : 《重审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以李小江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8.6(2015): 109—124。
- [- - - . “Reexamining the Chinese Feminist Practice and Gender Difference Discourses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Li Xiaojiang.” *Journal of Nank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48.6 (2015): 109 - 124.]
- : 《王苹与中国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主流女性主义文化、多维主体实践和互嵌性作者身份》,肖画译,《妇女研究论丛》4(2015): 74—88。
- [- - - . “Wang Ping and Socialist Chinese Women's Cinema: Mainstream Feminist Culture, Multifaceted Practice, and Embedded Authorship.” Trans. Xiao Hua.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4(2015): 74 - 88.]
- Wang, Ning. “Gender Studies in the Post-Theoretical Era: A Chines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4.1(2017): 14 - 30.
- 克莉丝·维登 《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白晓红译。台北: 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Weedon, Chris.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Trans. Bai Xiaohong. Taipei: Laureate Book Co., Ltd., 2011.]
- 钟雪萍 《“妇女能顶半边天”: 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09): 54—64。
- [Zhong, Xueping. “Fou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logan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Journal of Nank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09): 54 - 64.]

(责任编辑: 王嘉军)